

歷代名臣上皇帝書

张建业 王玉璋 编



歷代名臣上皇帝書

中石題

京新登字209

历代名臣上皇帝书

张建业 王玉璋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36号)

天津新华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发行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7.625 字数440千字

1992年2月北京第一版 1992年2月第一次印刷

ISBN7-5402-0382-X/K·0118

定 价：9.80元

文学史研究中一个不应再被忽视的领域

——论历代名臣上帝王书的价值（代序）

在中国文学史研究中，有一个领域长期被人们忽视以至遗忘了，这就是历代臣下向帝王的上书。忽视这一领域的原因，不外两点，一是认为这类作品既然是向帝王的呈文，一定带着浓重的封建思想；二是从艺术上看，文学意义不大，远不及诗歌、小说、戏曲以及其他散文有价值。其实，这种看法是不够全面的。

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社会中，或出于社会的、个人的需要，或出于政治的、文化的原因，历代臣下写出了数量极为浩瀚的上帝王书。除了那些奏疏专集，我们几乎可以从所有臣子、文士的集子中看到这类作品。而且，由于这些上书是直陈帝王，关系重大，也往往成为精心之作。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治安策》，晁错的《论贵粟疏》，孔融的《荐弥衡表》，诸葛亮的《出师表》，曹植的《求通亲亲表》，李密的《陈情表》，李潕的《革文华书》，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陆贽的《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韩愈的《论佛骨表》，欧阳修的《准诏言事上书》，司马光的《进〈资治通鉴〉表》，陈东的《上高宗第一书》，刘勰的《率太学诸生上书》，许衡的《时务五事疏》，海瑞的《治安疏》，杨继盛的《弹严嵩疏》，康有为的《公车上书》等等，历代传颂不绝，成为古代散文中议事言情的代表作品。正因为如此，从萧统编纂的《昭明文选》开始，这类文章为历代

选家所重视，直至宋代赵汝愚编纂的《诸臣奏议》一百五十卷，明代黄淮、杨士奇奉成祖之命而编纂的《历代名臣奏议》三百五十卷。同时，这类文章，也为历代文论家所重视。曹丕《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把文体分为“四科”，而“奏议”则居其一（“书论”中也包括有臣下上帝王的作品）。刘勰《文心雕龙》则专列“章表”、“奏启”、“议对”三篇，以探讨向帝王上书这一文体的特质。到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和徐师曾的《文体明辨》，更把这类文体作了细密的分类和研讨。这些文论家的意见固然都有可商榷之处，但他们对章奏谏疏这类文章的重视，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这类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内容广泛，从这类文章中，我们不仅可以从一个方面研讨各个不同历史时代的社会情况，而且也是研究古代文体论的一个重要内容，特别是对探讨古代议事陈情散文的特征及其发展变化，更是不可不注意的一个重要侧面。

二

臣下向帝王的上书，历代名目繁多，且不断有所变化。举其要者，先秦有“谏言”（《国语》《战国策》中有大量记载）、“上书”（如乐毅：《报燕惠王书》）、诰（古时上下皆有诰，下以诰上者如《仲虺之诰》）、箴（如《左传·襄公四年》所载的《虞箴》）、问对（如宋玉《对楚王问》）。秦汉而后，又有“尺牍”（如《史记·仓公传赞》：“缙紫通尺牍，父得以后宁”，表明缙紫为救父给汉文帝的上书也称“尺牍”）、“对策”（如晁错：《贤良文学对策》）、“策”（如贾谊：《治安策》）、“表”（始于秦汉，但西汉以前的表文已散佚不存，东汉著名表文如孔融的《荐弥衡表》）、“章”（如曹植：《改封陈王谢恩章》）、“议”（如吾丘寿王上汉武帝的《议禁民不得挟

弓弩对》)、疏(如贾谊:《论积贮疏》)、“启”(如三国魏刘辅:《论赐谥启》)、“弹事”(如南朝梁任昉:《奏弹曹景宗》)、“奏”(如南朝梁贺琛:《陈子条封奏》)、“状”(如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札子”(如苏轼:《乞校正陆贽奏议进御札子》)、“封事”(如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等等。

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上书,当为《尚书》中的《周书·无逸》^①。《无逸》是周公诫成王之辞,成王初政,周公深恐其淫逸荒嬉,特意告诫他要“知稼穡之艰难”,要他效法文王勤劳节俭,“怀保小民”,“惠鲜鰥寡”,“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不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文中所表现出的以殷为鉴,敬天保民的思想,反映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进展,在当时颇具进步意义。该文虽也佶屈聱牙,但叙述条理清晰,议论多引历史事例,表现出记述文、议论文的明显进步。

春秋时期,生产力迅猛发展,社会分工日渐复杂,促使社会上的阶级分化日趋激烈。各个统治集团为了争得或巩固自己的政权,纷纷寻找自己所需的思想武器,于是,各种思想派别就应运而生。这些不同思想派别的代表人物,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向君主们出谋划策,进言劝谏,并要求达到有效地说服人主的目的,都特别注意对讽谏、应对、辩诘的技巧的钻研。这个时期臣下向君主的书面上疏虽然不多,但那些凭嘴而说的谏辞、说辞,语言精炼,逻辑性强,很注意修辞的形象性、生动性,不但代表了这个时期臣下向君主游说的精神与价值,对后代章奏谏疏这一文体的发展也有着重大影响。这类作品在《左传》特别是《国语》中可见其面貌。

这种谏辞、说辞独具特点,在战国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初步确立并蓬勃发展的时代。周平王东迁以后,作为天下宗主的周王朝已失去了控制各诸侯国的力量。

从三家分晋，到秦并天下统一全国，七雄并列，相互攻伐，社会矛盾空前激烈，迫使各国统治者谋求兴存之策。另一方面，由于铁器的普遍使用，土地得到迅速开发，打破了奴隶制社会的土地制度，新兴地主阶级勃起，商人势力也日趋壮大。新的政治形势，迫使各诸侯国实行内政改革，从而形成了变法改革的社会潮流。就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在当时的政治、文化领域中，各家学说争相竞长，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一些出身于地主阶级和没落贵族阶级的士，各有师承，各倡其说，争奔狂走，摇唇鼓舌，游说于各国君主，为其“出奇策异智”，使其安危逆转。而各国统治者为存亡计，也极力网罗“高才秀士”，各贵族卿相诸如战国四公子也争相养士，于是便演出了许许多多令人兴奋催人落泪的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总之，那是一个纵横捭阖的时代，更是一个饶舌智辩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里，君主们握有生杀大权，但在才智上却显得苍白多了。与之相较，那些策士谋臣们，甚至一介布衣，鸡鸣狗盗之徒，引车卖浆者流，倒显得光彩灿烂。他们对各国君主抵掌而谈的谏辞、说辞，与春秋时代的谏辞、说辞相比，气度更为恢宏，言辞更为酣畅，说理更加透辟形象，甚至润饰得更富有文学色彩。究其原因，是社会斗争使然，人主不礼贤下士则不能网罗人才，策士不侃侃而谈则难以打动君心。为此，可以这样说，时代的民主气氛造成了灿烂的辞章，尖锐的政治斗争带来了激荡的文彩，这一点在臣下的上书中同样得到证明。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说：“战代任武，而文士不绝。诸子以道术取资，屈、宋以《楚辞》发彩，乐毅《报书》辨以义，范雎《上书》密而至，苏秦厉说壮而中，李斯《自奏》丽而动；若在文世，则扬、班俦矣。”刘勰称乐毅的《报燕惠王书》为“辨以义”，范雎的《上书昭王》为“密而至”，苏秦的游说之辞为“壮而中”，李斯的《谏逐客书》为“丽而动”，并把这些上书、谏辞与屈原、宋玉并称，与杨雄、班固媲美，实可为中

肯评价。

自从秦并六国，中国出现了空前统一的政治局面。汉朝统治者目睹秦王朝短期覆灭的教训，采取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安定、发展生产的措施，使社会经济得到一定恢复。在政治思想领域，汉初除秦挟书律，文网较疏，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发展，思想比较活泼。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汉初文士多能积极参加到现实的政治生活之中，并以秦王朝的短期覆灭为鉴，总结历史教训，提出解决现实社会的政治问题，从而促进了政论散文的发展。著名作家如贾谊、晁错等，他们以文陈政事，论得失，针砭时弊，畅谈治策，文章富于感情，言辞激切畅达，颇具战国游说之辞的遗风。而这一特点，最突出的表现在他们那些上帝王的章奏谏疏之中。贾谊的《陈政事疏》，晁错的《守边劝农疏》等，都是这类作品的代表名篇。就是枚乘的《上书谏吴王》、邹阳的《狱中上书自明》，也何尝不是感情充沛，议论横生。总之，这个时期的上帝王书，不仅是该时期散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能表现这一时期散文特色的作品之一。在贾谊、晁错的影响下，两汉论者辈出，就是唐、宋的章奏谏疏，以至一般的政论文，也莫不蒙其远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人们的思想受到禁锢，对散文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发展到西汉后期，受董仲舒及今文学家以阴阳、灾异说时政的影响，包括奏疏在内的一些政论文，更是蒙上神秘说教的外衣，迂腐板滞，极少文学气味了。但是，在东汉反谶纬迷信的斗争中，相继产生了桓谭、王充、张衡等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们的章奏谏疏一类文章，也发出了异样的光彩，如桓谭的《上疏论谶记》，张衡的《黜图谶疏》，在当时都具有重要的反神学、反迷信的意义。

汉末魏晋之际，我国的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随着社会的巨大变动，儒学一尊地位的动摇，思想界呈现出一种解放的趋势。特别是在重刑名尚通脱的曹操这个“改革文章的祖师”的鼓

吹下，这时的散文，无论抒情、叙事或议论，都趋于自由活泼。章奏谏疏一类的议事陈情文章，也都受有这种时代风气的影响。曹操《请增封荀彧表》的清峻简练，诸葛亮《出师表》的质朴直率，曹植《求通亲亲表》的强抑悲愤，李密《陈情表》的委婉深情，都写得生动感人，文字如直出肺腑。同时，自汉代以来，政论文受辞赋的影响，善于铺陈，多用排偶，到魏晋之际，更发展为词藻华丽、对偶工整、讲究声律的骈俪文体。这些对堂而皇之的奏议一类文章也产生了直接影响。

讲究词藻、对偶、声律的骈体文，固然也不乏好的作品，抒情、叙事以至议论文中吸收了骈体文的一些写作方法固然也可以增添一定的艺术色彩，但从总体上看，骈体文有着更多的形式上的束缚，不能广泛的适应社会生活的需要。因此，隋文帝登基不久，就下了“公私文翰，并宜实录”的诏令，并惩罚了文表写得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李谔的《革文华疏》更直斥齐梁文章为“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但是，由于风习日久，积重难返，就是李谔这篇奏疏也没能摆脱骈偶的束缚。不过李谔的文章与六朝的骈体文体也大不相同，它不但内容充实，而且文词生动，笔力遒劲，富有论辩色彩。从李谔的这篇文章，我们已看出奏疏这一文体发展的新趋势。这一发展趋势，到唐朝的奏议就更加鲜明。以直言敢谏而著名的魏征，其章奏谏书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直言诤谏的特点，而又气势雄俊；一方面又用骈偶句式，却又词旨剴切。这一点，对后来的陆贽、欧阳修、苏轼等人都产生了直接影响。到古文运动的先驱陈子昂，其文章虽仍不脱六朝“偶俪卑弱之体”，但他的“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已表明章奏一类文体的变化。张说、苏颋则完全不用骈体写章奏。李华、肖颖士、独孤及、元结、梁肃等人，都是古文的提倡者，他们的章奏之类不少都脱离了骈体文的藩篱。陆贽的奏疏曾被人推为“有

足为万世龟鉴者”②，观其文风，内容上讥陈时病，深切著明，行文上虽多用排偶，却不严格拘于对仗，更是骈体文向单行散句“古文”过渡的一种表现。中唐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名为复古，实为革新，要求建立一种内容充实自然，语言新颖独创，文气通畅流转的语体文，韩、柳等人的章奏也体现了这一特点。

唐朝不少作家虽然不同程度地抵制了骈体文的流行，特别是韩、柳等人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古文运动，创造了不少独具风格的语体散文，但他们并没有能摧毁骈体文的优势，唐末五代，骈体文仍占据着统治地位，皇帝诏书，官方文件，也还都是骈体，章奏一类的上帝王书更受着骈体文的严重影响。但是，在那些有感而发，针贬时弊的章奏中，我们也清楚地看到，那种俚黄妃白的四六文体，由于不能很好地表现思想内容，正在逐渐消失其地位，而为那种可以比较自由地议事言情的散体文所代替。章奏这种文体上的变化到宋代更为明显。特别是到了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他们把诗文革新运动推向高潮，在散文领域，一扫骈体文的积弊，使包括奏疏在内的散文沿着健康的道路向前发展。

元明清三代的散文，深受唐宋影响，但就章奏一类文体而言又有所不同。元代在残酷的民族压迫下，奏疏较少，且缺乏前期那种尖锐性。但一些被重用的汉族知识分子提倡汉法的章奏，在促进汉蒙的融合上起到了一定作用。明朝提倡理学，大兴文字狱，影响到文学，或讲复古，或谈性灵，虽然在不同方面有些贡献，但与时事都有一定距离。倒是一些章奏却能大胆直陈时弊，抨击权奸，产生了象海瑞《治安奏》、杨继盛《弹严嵩奏》、祁彪佳《陈三大弊政疏》等充满浩然正气的谏疏文章。清代统治者处处模仿明朝，对文人的禁锢更加严厉，散文创作虽不乏其人，而且骈、散同行，成绩虽较元、明为佳，但还是不及唐、宋。章奏一类作品虽不少涉及当时的朝政要策，但是那种富于批判性的

谏疏文章却不多见。鸦片战争以后，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思想的发展，文学主张的更新，使散文创作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特别是政论文的发展更为突出。如康有为为了政治上变法的需要，写了大量具有鲜明时代性和战斗性的政论文，而上清帝的七封政书和戊戌变法时期的大量奏议更成为其代表作。这些章奏饱含激情，笔锋犀利，说理透辟，而且大笔淋漓，言人之所不敢言，成为这一时期散文创作的光辉代表。

三

庸庸讳言，在汗牛充栋的章奏谏疏一类作品中，对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之作，无聊的酬谢贺赞之文，那是屡见不鲜的。但也有不少作品，或议国家大事，或论朝政得失，或攻讦种种时弊，或直斥帝王的昏聩，都从不同方面表现出可贵的思想价值。特别是其中的谏疏部分，具有着更强的战斗性。

“文死谏，武死战”，曾被作为封建时代文臣武将的最高行为准则。在这个口号下，固然有着封建的政治目的，固然有着虚伪的道德说教，但也应该看到，在那种带有忠君思想局限下，确实有些名臣文士因为敢于犯颜直谏而留下了英名，一些帝王也以善于纳谏而博得了人民的赞誉。封建时代是帝王一人的天下，帝王独揽生死大权，可以为所欲为。而“人主之所患，莫大乎唯言而莫予违”^③，因此，为了统治阶级自身的利益，统治者也采取了一些限制帝王权力的措施，谏官制度的设立，“文死谏”观念的鼓吹，就是其一。《孟子·离娄篇》指出：“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臣下进谏言的目的是要“进苦口之药石，针害身之膏肓”，“上以格君心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历代有不少臣下，以“美曰美，不一毫虚美；过曰过，不一毫讳过”的态度，写出了不少富于批判性的谏疏，成为章奏一类上帝王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

对封建政治黑暗的揭露，是章奏谏疏的重要内容与特色之一。在我国长期的封建统治下，固然不乏可以赞誉的贤君明相，也固然不乏比较清明繁盛的历史朝代，但，阶级的压迫，人民的苦难，朝政的腐败，宦竖的专政，官吏的倾轧，以至君主的昏聩，有时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这种现象不仅引起具有进步思想的臣子名士的愤慨，就是那些带着严重封建思想而比较正直的官吏们，也会怒而揭发之，批判之。西汉哀帝时，外戚专权，皇室倾危，不辨忠奸，一味重用专事阿谀奉承的如董贤之类的小人。为此谏大夫鲍宣屡次上书言事，指责哀帝昏聩无能。在《上哀帝书》中，更愤怒指斥当时的朝政是“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以致使广大人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不仅如此，他还进一步揭露造成这种社会惨象的原因就在于皇帝为了“自专快意”，而“取非其官，官非其人。”鲍宣的这一认识，不仅在一定意义上指出了西汉王朝所以灭亡的原因，而且也揭示了我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屡见不鲜的不治之症。三国时东吴的贺邵，在《谏孙皓疏》中，直斥昏君孙皓“严刑法以禁直辞，黜善士以逆谏臣，眩耀毁誉之实，沈沦近习之言”，“法禁转苛，赋调益繁”，弄得百姓“老幼饥寒，家户菜色”，士兵“衣不全短褐，食不赡朝夕”，甚至“父子相弃，叛者成行”。并告诫孙皓：“长江之限不可久恃，苟我不守，一苇可航。”言辞激切，深中当时东吴的时弊。唐代章奏谏疏，很多都是从正面立论的，如魏征的一些作品。但也有对政治黑暗的指斥，如陈子昂《谏用刑书》反对武则天滥用刑罚，诛杀无辜；辛替否《上陈时政疏》对中宗昏庸误国的批判，对睿宗步中宗后尘的警告；陆贽《奉天请罢琼林大盈二库状》，尖锐地揭露了德宗在国难当头之际，还见物则迷，贪财昏聩，以致引起了军情怨望、民众思乱的严重后果；韩愈《论天旱人饥状》，真实地记录了在天灾吏苛交织下遭

成的“弃子逐妻以求口食，圻屋伐树以纳税钱，寒馁道途，弊路沟壑”的惨象，尖锐地暴露了封建统治者的罪恶；刘蕡《对贤良方正言极谏策》对阉宦专权将倾社稷的论述，对文宗外畏藩镇、内惧宦党的指责，以及对当时人民痛苦、吏治腐败的描述：“今四海困穷，处处流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鳏寡孤独者不得存，老幼疾病者不得养。加以国权兵柄，专在左右，贪臣聚敛以固宠，奸吏寅缘而弄法，冤痛之声，上达于九天，下入于九泉，鬼神为之怨怒，阴阳为之怨错。”这样尖锐抨击时弊的文章，在唐代其他散文著作中是不多见的。宋朝的章奏谏疏，对冗官冗兵的批评（如包拯《论冗官财用疏》），对官方政治的抨击（如欧阳修《准诏言事上书》），对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横征暴敛的揭露（如杨万里《转对札子》），对投降卖国行为的痛斥（如胡铨《戊午上高宗封事》），以至对朝政黑暗、皇帝昏庸的攻击（如刘黻《率太学诸生上书》）等，都有深刻的认识价值。明朝海瑞的《治安疏》痛斥嘉靖迷信道教、妄想长生的荒谬，以及由此造成的国贫、吏贪、将弱、民困的严重局面；杨继盛《弹严嵩疏》对权奸严嵩“十大罪”、“五奸”的揭露；祁彪佳《除三大弊政疏》对明朝以厂、卫为中心的“以锻炼为功，以罗织为事”的惨酷特务统治的批判，更是惊心动魄，极富战斗精神。

历代名臣的章奏谏疏，在对封建政治黑暗进行揭露的同时，还提出了不少可贵的政治见解，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促进国家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李斯的《谏逐客书》，条陈缕析地驳斥了秦宗室大臣“请一切逐客”的荒谬意见，制止了秦始皇的逐客行动，对秦国的统一中国起到一定作用。贾谊、晁错在章奏中提出的削弱诸侯势力以加强中央集权，募民备塞以抗击匈奴贵族的掠夺，劝农贵粟以发展生产，以及积极进取、力主改革而反对因循守旧、无所作为的主张，对于发展封建经济，巩固国家的统一，都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文景

之治”的安定繁荣，从而为汉武帝时的文治武功建立了物质基础。三国时，人们更多称道的是曹氏父子、邺下文人集团和西蜀诸葛亮的文章，这是对的。但就章奏一体来看，东吴也并非没可称道处。其实东吴的一些名臣上疏，也是很能表现出政治家眼光的。如薛综、陆逊等人的上疏反对孙权远征辽东就是一例。辽东军阀公孙渊曾与曹魏抗衡，并派使者南通东吴。孙权不顾群臣反对派出太常张弥等人乘海船至辽东立渊为燕王。但公孙渊又恐孙权远不可恃，反而杀死张弥等，并将首级献给魏明帝。孙权盛怒之下，依仗着他宏大的舰队，决定御驾亲征。其实这是极为荒唐的，因为当时威胁东吴政权的劲敌是曹魏、蜀汉，而不是辽东公孙渊。孙权置此不顾，那是战略上的错误，而且，在当时技术条件下，跨海远征，也是冒险行为。薛综、陆逊等人的上疏就是为此而发。薛综的《谏征公孙渊疏》简明有力地说明冒险远征辽东的不可取，并提出“中国一平，辽东自弊”，要孙权把注意力集中到占据中原的曹魏，而不要“违必然之图，寻至危之阻，忽九州之固，肆一朝之忿”，是很有见地的。

由隋唐至清的章奏疏谏，更是不乏杰出的政治见解。牛弘《请开献书之路表》，在总结了我国典籍屡遭厄难的经过后提出广开献书之路的建议，李谔《革文华书》对六朝以来浮艳文风的批判，对我国文化的建设与发展都有着重要的价值。魏征、狄仁杰、陈子昂、陆贽、韩愈、柳宗元等，在章奏中提出的重视民心、励精图治、亲忠远佞、刑赏得当、崇俭禁奢等，对唐朝的政治都发生了直接影响。宋代臣下的章奏针对积贫积弱、冗官冗兵的朝政而提出的种种政治建议，针对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统治者妥协投降而提出的抗敌主张，虽然很多并不被统治者所采取，但却闪烁着思想的光辉。这里我们应该特别一提元朝的许衡和近代的康有为。蒙古建国之初，关于采取什么政策以统治汉地产生了激烈争论。一些蒙古近臣曾主张“汉人无补于国，悉空其人以为

牧地。”④而汉化的契丹贵族耶律楚材却坚决反对这种倒退措施。忽必烈即位后，围绕采用汉法问题的斗争更为激烈。这时许衡上了《时务五事疏》，详细论证了以汉法确定治国规制的必要，并以历史上少数民族建国后“必行汉法乃可长久”为证加以说明，对于忽必烈采用汉法、任用汉人这一进步措施起了有力推动作用。所谓汉法，不仅仅是指中国传统的封建剥削方式，更主要的是指包括一整套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这种生产方式与上层建筑固然也有其局限，但与蒙古族保守落后的“旧俗”相比，则表现出明显的进步性。汉法的采用，进一步促进了蒙古族封建化的速度，促进了汉蒙之间的互相影响与融合，因此，许衡的上书，其理论依据虽然仍不脱儒家那一套封建等级观念，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其进步意义是极为明显的。康有为生活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之际，时代的风雨，促使他成为一个变法维新的思想家、政治家，他那热情的变法维新之说，激进的反对封建守旧势力的思想，以及抗御外敌的爱国主义精神，都鲜明地表现在他上清帝的七封书和戊戌变法时期的奏议中。这些文章都是为时而发，不但有着强烈的批判性，也提出了具体明确的政治主张，这些主张，在当时历史条件下，顺应着社会发展的潮流，对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影响。

历代章奏谏疏还宣传了不少可贵的思想见解，这也是极有价值的。如：

民本思想的张扬。

在封建时代，帝王是“天之子”，是“天下臣民万物之主”，真是“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⑤一切都在帝王的统治之下。在这种帝王具有无限权威的时代，民本思想的张扬，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历代臣下在章奏谏疏中对封建政治黑暗进行揭露以至对封建帝王昏聩进行批判时，运用的一个重要武器就是民本思想。春秋战国之时，随着奴隶制的崩溃，民本

思想得到了发展，孔子讲的“泛爱众”，子夏讲的“四海之内皆兄弟”，墨子讲的“兼爱”，以至孟子提出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人民地位的提高。我们看《左传》《国语》《战国策》以及先秦诸子中对君主的一些说辞、谏辞，处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民本思想的宣传。《左传》中谏臣们多次强调的要“视民如子”、“视民如伤”，而把“以民为土芥”看成是亡国的原因；《国语》中邵穆公谏周厉王时提出的“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及“民言不可壅”的道理，都是以民本思想作为自己进谏的根据的。民本思想对我国历代的进步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都产生了积极作用，同样也贯串在他们向帝王上的章奏谏疏中。他们或提出“治天下者当用天下之心为心，不得自专快意而已”⑥，“天下之天下，非独陛下之天下也”⑦；或高举“民者国之本”⑧，“保国之大计，在结民心；⑨；或用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以告诫帝王应该谨慎地对待百姓：“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宜所深慎”⑩；或从正面说明君主主要想保持自己尊贵的地位就必须了解百姓的疾苦：“臣闻国君之所以尊者，重其社稷也。社稷之所以重者，存其百姓也。苟百姓之不存，则虽社稷不得固其重。苟社稷之不重，则虽国君不得保其尊。故理天下者，不可不知百姓之情也。”⑪这一切虽然都是从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出发，但客观上也缓和了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对社会的安定，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

唯物思想的宣传。

在奴隶社会，天及代表天意的帝王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人世间的治乱兴衰、吉凶祸福都由天意决定，神权高于一切。后来，随着奴隶制的解体，封建制的发展，神权开始动摇，人的作用被得到肯定与重视。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统治者也没有忘记用天道鬼神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思想武器。因此，重人事的唯物思想与尊神鬼的唯心思想的斗争就成为封建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一

个重要内容。这一点在历代章奏谏疏中也有鲜明体现。春秋战国时的说辞谏辞已明显地表现出对天道的怀疑，对人事的重视。汉代以巫师方士为主而编织的图谶之学，把自然界的某些偶然现象神秘化，并附会到社会的安危，朝代的兴亡，为封建统治的政治服务。东汉光武帝刘秀甚至把这种迷信思想宣布为合法的“国宪”，对于那些有所怀疑的人，轻则不准做官，重则几遭杀身之祸。但是，一些唯物主义的思想家仍然无所畏惧，用谏疏的方式，向这种官方迷信思想以至帝王本人进行了斗争和谏诤。桓谭的《上疏论谶记》尖锐指出：“今诸巧慧小才伎数之人，增益图书，矫称谶记，以欺惑贪邪，诳误人主。”并且直斥刘秀“乃欲听纳谶记，又何误也！”这种批判是极富现实性的，因此激怒了刘秀，桓谭差一点被拿下斩首。张衡的《黜图谶疏》是继桓谭之后对图谶迷信发出的又一次攻击檄文。当时图谶迷信之学继续泛滥，而且“儒者多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针对这种情况，张衡在上疏中通过对图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考查，指出图谶纯系“虚伪之徒”为“要世取资”所捏造，其目的不过是为了“欺世罔俗，以昧势位”，用以欺世盗名、蒙昧君主而已。在此基础上，张衡建议“宜收藏图谶，一禁绝之”，显示出反神学、反迷信的重要意义。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后，经过南北朝统治者的提倡，势力愈来愈大。到了唐代，除个别外，皇帝几乎都迷信佛教。号称一代英主的唐太宗就是虔诚的佛教徒，武则天更是靠佛教徒制造的舆论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正是在统治者的竭力倡导下，唐代佛教势力极大，不仅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甚至可以干与朝政。其结果是劳民伤财，严重侵犯了广大人民的利益。在这种情势下，不少名臣文士都起而向佛教展开斗争，其中付奕、狄仁杰、辛替否、薛存诚、韩愈等，更是突出的代表。他们向佛教进行斗争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向皇帝上疏，以揭发佛教的虚妄和危害。付